

# 理論建構與政治研究

易君博

目 要

前言 一、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 二、政治研究的狀況

三、現代政治研究的主要方向 結語

## 前 言

政治研究的整個領域中，到了一九五〇年以後，可以說沒有一個範圍不受到行爲研究法的影響。(註一)行爲研究法的強調，已經使政治研究較多的接受了經驗的及量化的研究方式，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可是，政治研究是否達到了充分科學化的水準？或者政治學是否已經成爲經驗科學的一種？依然是方法論上爭論的問題。這種爭論，同時涉及到科學的性質及政治研究的狀況；對這兩方面所持的觀點不同，便會得到不同的結論。本文企圖努力從事的一項目標，祇是從澄清上述問題以指出政治研究通往充分科學化的主要方向。

一切成熟的科學都是理論的，科學化的問題即是一個理論化的問題。任何研究，祇要它的歷程符合經驗理論的建構原則，便屬於科學的研究。因此，政治研究是否已經科學化的問題，或者政治研究如何科學化的問題，必須依據理論建構的原則，才可能作比較有效的回答。由於此一前提的肯定，於是本文的分析及論證乃是從——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政治研究的狀況、以及今後政治研究的主要方向——三個方面分別作一說明。

### 一、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

當代最傑出的科學哲學家波卜爾 (Karl R. Popper) 教授，在他的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中，關於科學的性質，曾如此說：「各種不同的經驗科學即是各種不同的理論系統。因此，科學知識的邏輯當可視爲各種理論系統的基礎理論。」(註二)若

就這兩句簡單的話，稍加探究，便不難發現其涵義的深遠。這兩句話中，一方面肯定了經驗科學與理論系統的密切關係，其密切的程度幾乎可以說是二而一的；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各種經驗科學的理論之建構，乃是根據一個共同的邏輯或基礎理論而進行的。前一方面之肯定等於是說：在科學研究中，理論化 (theorizing) 的推進比實驗或事實的調查，也許佔了一個更重要的地位。後一方面的暗示也無異乎指出：科學的理論化並非來自任意的沉思冥想，却是根據後設理論 (metatheory) 或一套建造理論的原則而推進的。

理論化或根據後設理論而建造理論，乃是一種研究活動的過程。此種過程，以方法論的術語說，即是理論建構 (theory construction)。理論建構與理論，雖有密切關係，但並不是完全同義。後者是前者追求的目標，前者是建造或修正後者的過程。由於二者的關係密切，爲了說明理論建構的性質，不能不先說明理論的性質；爲了分析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當然也會隨時提到理論。以下的分析次序，是先論及理論及理論建構的性質，再才說明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

### 1. 理論及理論建構

關於理論的涵義，其了解之分歧，在有關於方法論的基本名詞中，也許是爭論較多的一個。理論性質的深入討論，絕不是一篇短文可能勝任的。在此，祇是從經驗科學的角度，對理論的性質作一簡單說明。

一位社會科學的哲學家魯德納 (Ricard S. Rudner)，曾爲理論提供了一個界說，他說：「凡是一套陳述或某些類似定律的通則，其相互間具有系統上的關聯性及經驗上的可證性，便是一個理論。」(註三) 這個界說中，其界定項 (definiens) 指出了形成理論的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是邏輯上的系統推演，第二是經驗上的事實印證；缺少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便不是理論，至少不是經驗科學中所謂的理論。這即是說，倘若一套陳述，雖有經驗上的印證性，却缺乏邏輯上的推演性，不得稱之爲理論；反之，雖符合邏輯上的推演性，却没有經驗上的印證性，也不得稱之爲理論。理論的建造與修正，永遠脫離不了經驗印證與邏輯推演兩個方面的交互考驗。任何一個學科，雖可能抽離幾個理論的共性，再通過經驗的證明，而成爲一個解釋經驗現象更廣的理論，但不可能得到最後的理論。理論永遠有其被修正及被擴充的可能。從一個長遠的時間看，理論永遠處於工作假設的地

位，瀰滿在整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研究產生理論，理論又是推進研究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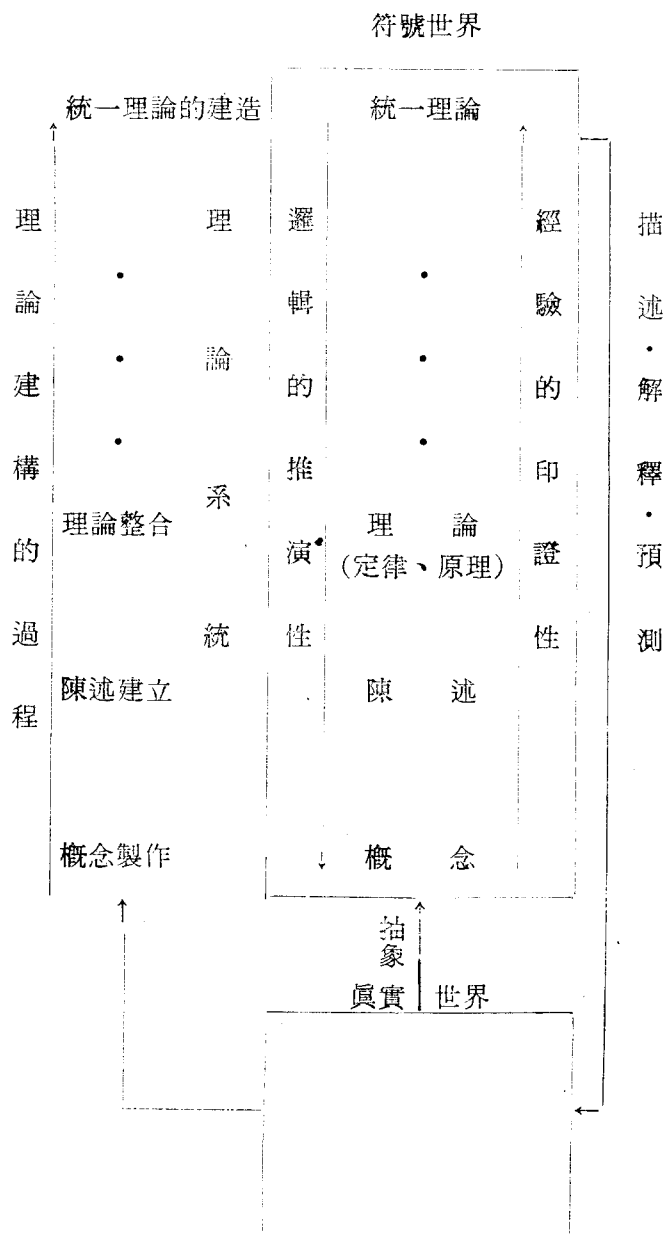
理論的組成分子是一套陳述或類似定律的通則。陳述或通則，都要依賴語言的表達。不論自然語言 (natural language) 或建構語言 (constructed language)，莫不是一些代表概念的名詞或符號所組成。因此，陳述或通則的最後基礎乃是概念，都是眞實世界 (real world) 的具體事物之抽象，或者根據此種抽象的再抽象，而產生出來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或抽象是從眞實世界開始建造理論的原始起點，也可說概念是眞實世界與符號世界 (symbolic world) 或理論世界之間的溝通站。經驗科學的理論化，不僅要求陳述、通則、定律、原理及整個理論系統，必須具有經驗的印證及邏輯的演繹，而且要求每一個基本概念也必須具有經驗上的指涉。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雖不是直接的可觀察項，但無論如何，要能通過化約 (reduction) 而可變成感覺資料 (sense data) 的函數。(註四) 祇有根據具有經驗指涉的概念，而建立起來的陳述，才可成爲經驗理論的基礎。

在經驗科學中，一個理論也常常稱做定律 (laws) 或原理 (principles)。定律與原理的差別，是以解釋的範圍作爲標準的。定律解釋的現象比較窄，原理解釋的現象比較寬。在一個獨立的學科中，一切形式的個別理論，必須加以整合，使其成爲一個足以涵蓋整個學科範圍的理論。這個理論便是其所屬學科的統一理論 (united theory)，一般理論 (general theory) 或系統理論 (systematic theory)。一個統一理論，對於一個學科說，是最高層級的理論。它統攝其他一切較低層級的理論，而成爲一個理論系統 (theoretical system)。由於每一個個別的理論，乃是一套陳述的關係，而陳述又是銜接眞實世界的概念之組合，因此，整個理論系統不僅包含一組個別理論，而且必然也包含一切構成這些理論的陳述及概念。一個理論系統乃是關於眞實世界的一個抽象建構，並且對於眞實世界具有經驗的說明性，其內部的層級結構，自上而下說，從最高層級的統一理論，通過個別理論、普遍陳述及單稱陳述，到最低層級的基本概念，乃是一邏輯的推演系統；自下而上說，從基本概念，通過單稱陳述、普遍陳述及個別理論，直到統一理論，任何一個層級不具有經驗的事實印證作爲基礎。在整個層級系統中，任何一個基本概念

的修正或否定，必然導致統一理論的修正或否定；從任何一個層級到另一個層級，若爲邏輯推演所不容，亦必然引發統一理論的解體。換言之，一個理論系統，對於任何概念，任何陳述，任何個別理論的介入 (introduction) 或容納，除了要具有經驗印

證的可能性，還必須符合這個系統中的邏輯推演。任何理論系統，與屬於它的研究活動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並互為工具的。研究是試驗理論系統及擴充理論系統的手段；理論系統又是指引研究活動並提高研究活動的工具。二者交互影響，不斷向前推動，永無止境。

總括的說，理論系統的建構，包含了四個層級：第一層級是概念製作，第二層級是陳述建立，第三層級是理論整合，第四層級是統一理論。每一個層級以及層級間的關係，必須既有經驗的印證性，也有邏輯的推演性。理論系統是屬於符號世界的，但是，它的最後基礎乃是建立在真實世界中具體事物的抽象之上的。理論的抽象性愈高，則解釋經驗現象的普遍性也愈大。此一理論系統的說明，即等於理論建構或理論化的步驟之說明，可用下列圖示表現出來：



從理論建構的過程看，最高層級的統一理論，是每一個學科所企圖達到的目標。但祇有成熟的科學才實現了這個目標。判斷一個學科是否充分科學化，便要看它是否實現了這個目標。實現了這個目標便屬於充分科學化，反之，就不能算是充分科學化。一個學科若祇有一些個別的理论，沒有統一理論去整合它們，這個學科則不是一個理論系統。既不是一個理論系統，當然不得列入經驗科學之林。因為一個經驗科學必須要求自身是一個理論系統。

充分科學化與充分理論化是二而一的。任何學科如果充分理論化了，一定是充分科學化，反之，如果充分科學化了，一定是充分理論化了。統一理論的實現，是充分理論化的標誌。要達到這一境地，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從理論建構的層級看，祇有概念的製作、陳述的建立及理論的整合，都完全符合經驗印證原則及邏輯推演原則，才可能達成統一理論的建造。某一些學科，雖經千百年的發展，依然停滯在第一層級中，其概念的澄清工作及名詞的界定工作，都一直沒有達到成功的境地。這一步既未達到，陳述的建立及理論的整合，則不可能有效的推進，至於統一理論的建造，當然更談不到了。就是概念的製作、陳述的建立以及個別理論的建造，都已經符合建構的標準，而理論的整合尚未達成，並沒有獲致最高一層的統一理論，依然不算進入了充分理論化的境地。可見，一個學科要目稱科學是容易的，但要經得起理論建構的標準之衡量，仍然是科學，則非常困難。

## 2. 理論建構的重要性

一個學科，當其完成了理論系統之建構，達到了充分科學化的地步，並不等於研究工作的終止。科學的研究是永無止境的，永遠不斷向前進展的。在這一不斷向前進展的過程中，理論系統的建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因為沒有科學的理論，便沒有科學的描述、解釋及預測；沒有理論系統的憑藉，科學研究便難於產生累積的效果，以圖加速度的進步；沒有理論系統的背景，科學研究便不可能找到最經濟的途徑，而獲致新的研究設計。為着有效的討論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可分成三個方面來說明：第一是從研究的目的看，第二是從研究的設計看，第三是從研究的累積看。

### A. 研究的目的

科學產生於人類文化的活動中，它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部分。從文化功能學派的觀點論，科學祇是文化系統中的一個次級系統。科學研究的目的，當然是在維持及發展文化系統，進而改善人類的的生活。但是，從科學自身看，科學的目的則是描述、解釋及預測……科學家所探究的，即是在固定的研究系統(context of research)中，得到最適當最精確的描述、解釋及預測。(註五)任何一個經驗科學，它的研究對象必是經驗世界中的某一類現象，它的研究目的也必定是企圖對這一類現象得到描述、解釋及預測。但是，一個科學家若沒有既存的理論或理論系統作為背景，他便無法從事有效的描述，甚至不知道要描述什麼。(註六)至於解釋與預測，莫不依賴定律、原理或理論作為前提，去聯繫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所不同者，解釋是從已知的果去追溯其因，預測是從已知的因去推斷其果。這樣說來，不論描述、解釋或預測，除非依靠理論或理論建構的熟悉，便沒有有效從事的可能。

### B. 研究的設計

科學研究的過程，從某種角度看，乃是運用科學方法去回答問題的過程。(註七)一個良好的研究設計，便是有效回答問題的開始。研究設計的各種步驟中，其中有兩個最為重要：一個是假設的提出，另一個是資料的搜集。前一個步驟是後一個步驟的先決條件。祇有提出適當的假設之後，才可能搜集到回答問題的相干資料。任何一個問題，有其多樣回答的可能性。如何選擇有效的假設，以最經濟的方式回答問題，是研究設計中很難做到的一步。個別科學家的天才，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有助於假設的選擇，但理論的訓練乃是幫助選擇最有效的途徑。假若兩個研究者，天賦能力是相等的，熟悉相關資料的程度也相等，但其中的一個比另一個，在理論的訓練上及理論建構的理解上，要高得多要深得多，那麼可以斷言，前者選擇假設的能力一定比後者強得多。事實上，在任何科學研究中，既存的理論常常即是提供假設的重要來源之一。尤其在高度發展的科學中從事研究，若對於既存的理論系統沒有深度了解，可能便不知問題之所在，當然更談不到提出回答問題的假設了。

就是選到了適當的假設，在搜集資料的設計上，依然要憑藉理論及理論建構的熟悉。任意搜集資料是沒有意義的。搜集資料必須經過精心的設計，才能達到證明假設，澄清概念，或印證陳述及理論的目的。在既經成立的科學中，一個研究者，不論

為控制實驗的設計或經驗調查的設計，必須對整個理論建構的系統有透徹的了解，才可能製作出有價值的設計。一個對理論物理學毫無所知的人，能夠提出有意義的實驗設計，是我們不可能想像的事。一個對社會科學的理論沒有相當基礎的人，能夠製作出來够水準的問卷設計或局內觀察的設計，也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事。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研究設計方面，不論假設的製作或資料的搜集，都脫離不了理論的熟悉及理論建構的系統之了解。

### C. 研究的累積

在現代經驗研究的範圍中，成熟的學科與尚未成熟的學科，有一個很顯著的差異。那就是前者的研究有累積性，後者則無。成熟的學科，能濃縮前人研究的結果於一個嚴密的理論系統中。每一代人祇要通過這個理論系統接受訓練，便可從事最前線的研究。新的研究結果，又可繼續納入此一理論系統中，使其理論得以修正及推廣。如此日新又新，不僅可使理論系統日趨完美，而且可使研究得到加速度的進步。尚未成熟的學科，既然沒有一個屬於自身的理論系統，每一代人的研究，甚至每一個人的研究，幾乎都在不同的概念及不同的理論中，而從事進行。因此，每一個研究者必須要浪費時間和精力，來了解所有前人的研究結果。此種所謂研究，不是永遠停滯在前人的故紙堆中，便是忙碌於螞蟻似的資料搬動中，其結果當然談不到較多的進步與創新。這種情形，從物理學與政治學的比較，更得到說明。現代物理學的學習者，沒有必要的理由去看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可是現代政治學的學習者，對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似乎仍有一讀的必要。這不僅說明兩種學科的進展情況之懸殊，而且也說明兩類學習在時間節省上是如何的不同。研究的累積性，關係一個學科的進步甚大。在有累積性的學科中，每一代的研究者，可以很快的接受所有前人的遺產，從一個高水準的基礎上出發。在沒有累積性的學科中，一個研究者可能窮畢生之力，也許還不能了解一個古代大師的精髓之所在，往往徒勞無功。

一個學科能否累積許多代人的研究結果，並且不斷的向前發展，其先決條件乃是理論系統的有無問題。而理論系統又必須依賴理論建構的原則，從概念製作、陳述建立及理論整合逐層推進，才有其可能。可見，理論建構實等於研究能否累積的先決

條件之先在因素。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不論從研究目的、研究設計及研究累積而論，莫不直接或間接的受到理論建構的決定性支配。因此，可以肯定的說，一個學科要達成有效的科學研究，除非根據理論建構的型模去長期的有耐心的建造一個理論系統，便沒有其他任何的途徑可尋。

## 二、政治研究的狀況

當其對理論與理論建構的性質，以及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作了一分析之後，再來衡量政治研究的狀況，更進而探究政治研究的正確出路，則比較容易發現政治研究的缺點之所在，及克服其缺點的有效途徑。

政治研究，在整個學術領域裡，變成獨立的學科，雖是很晚近的事（註八），但是，政治研究的起源，却有一悠久的歷史。任何地域的古代文明中，不論思想家、史學家或人文現象的研究者，都莫不對政治現象深感興趣，而從事思考及探究。其所以如此，也許來自實用的動機，並非出自純真的好奇心。因為政府的決策，在任何時代的任何地區裡，常常是關係人們的幸福，影響整個社會的生活最不容忽略的一面。政治研究的起源，雖然如此悠久，可是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發展出來一個屬於自身的鞏固的理論系統。若與物理學科比擬，政治學的確顯得相當落後。

從古至今，各式各樣的政治研究，若根據它們建造「理論」的方式作為標準，可以分成三個基本的類型：第一個類型是神學的政治研究（the the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s），第二個類型是玄學的政治研究（the metaphysical study of politics），第三個類型是經驗的政治研究（the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s）。（註九）從古希臘到現代，所有的歷史層面中，或多或少都有從事政治現象的研究活動。這些研究活動建造「理論」的方式，不外乎神學的、玄學的及經驗的三個類型。比例上說，古代的政治研究屬於神學及玄學的成分多，經驗的成分少，現代的政治研究屬於經驗的成分多，玄學及神學的成分少。換言之，古代也有經驗的政治研究，例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他為寫「政治論」一書，就曾調查過一百五十八個不同的政體。（註一〇）



他之重視經驗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最古代的典型。又如文藝復興時代，馬志衛尼 (N. Machiavelli) 的「君王論」，就是竭力避免倫理及宗教的束縛，而勇敢的採取了純經驗分析的另個古代範型。反之，現代也有神學及玄學的政治研究，比如里柏 (Reinhold Niebuhr) 所提倡的「基督教的實在論」，相信合理的政治一定征服不合理的政治。(註一一) 其立論的精神，實有些像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的「天國論」，在二十世紀的翻版。至於耶士培 (Karl Jaspers) 的實存論的政治思想及羅柯 (Alfredo Rocco) 的「唯情論的法西斯主義」，雖立論各殊，但皆是代表十九世紀的玄學，在二十世紀裡的延伸。(註一二) 因此，這三個政治研究的類型，每一個類型都各有各的歷史，各有各的傳統，當然不可能逐一的加以討論及分析。在此，祇想根據理論建構的原則作為標準，而就三者的基本特性，作一分析及評價。

神學的及玄學的政治研究，雖是兩個不同的類型，但亦具有其共同的特點。為着討論的方便，可將二者合併起來分析。一切神學的及玄學的政治研究，都具有三個共同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基本概念的缺乏經驗指涉，第二個特點是價值陳述與事實陳述的互為推論前提，第三個特點是抽象概念的具體化 (the reific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神學的及玄學的政治研究，所使用的一切概念，雖非完全沒有經驗指涉，但是，某些基本概念的確沒有任何經驗上的指涉可言。比如奧古斯丁的「上帝」，黑格爾 (G. W. F. Hegel) 的「絕對」，盧梭 (J. J. Rousseau) 的「公意志」，以及里柏 (R. Niebuhr) 的「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都是一些無法了解的名詞。因為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概念，既沒有直接的經驗指涉，又不可能把它們化約成爲低層次的概念，而間接的得到經驗指涉。同時此兩類的政治研究，又常以一個單一的概念或一個先驗的原理 (a priori principle)，從毫無經驗意義的基礎上，去籠統的解釋一切的政治現象。比如唯心史觀，唯物史觀，形態史觀 …… 便都是這兩類政治研究的產品。

其次，神學或玄學的政治研究，有另外一個極普遍的共同傾向。那就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混爲一談。事實判斷是一個真假或對錯的問題，可以藉客觀的事物來印證。價值判斷是一個善惡或美醜的問題，常隨着主觀的願望及情緒而變動。比如「秦始皇曾經統一古代的中國」，這一陳述的內容是事實判斷，可以藉許多歷史事實來印證此一判斷的真或假。「秦始皇是一個

偉大的帝王」，這一陳述的內容是價值判斷，難得到客觀的公認；有的人承認，有的人否認。兩類陳述的性質既然不同，便不能互作推論前提，也即是說，從事實陳述不可能推論到價值陳述，從價值陳述也不可能推論到事實陳述。但是，神學或玄學的政治研究中，認為二者之間具有邏輯的演繹關係。黑格爾的名言：「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存在的。」便是肯定價值陳述與事實陳述可以互為推論前提的顯著典型。此類陳述看來雖很玄妙，但憑常識即可加以否定。例如，史大林的統治是真的，毛澤東的統治也是存在的，却不是合理的；和平是合理的，公道是善的，但又不一定存在。至於近代自然權利的觀念，若對其稍加分析，亦可發現其論證也是以事實陳述與價值陳述混為一談的例子。自然權利的觀念，若化成推論形式，即等於說：「凡是與生俱來的都是好的（價值陳述），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事實陳述），因此權利是好的（價值陳述）。」「凡是與生俱來的都是好的」是一個價值陳述，沒有經驗上的可證性；「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一個事實陳述，雖有經驗上的可證性，可是此一陳述，若證之以人類史的經驗，又不是真的；從一個沒有可證性的大前提，及一個假的小前提，怎麼可能得到「權利是好的」這樣一個結論呢？凡是價值陳述所表示的祇是可欲的狀態，並無經驗上的可證性。從事實陳述來證明價值陳述，或從價值陳述來證明事實陳述，都是不可能的，但神學及玄學的政治研究中，却常常以二者混為一談。

在神學及玄學的政治研究中，還有一個奇異的現象，這便是它們的第三特點——抽象概念的具體化。「上帝」、「國家」或「歷史」……等等名詞原是抽象的概念，但神學家或玄學家却認為是具體的存在，像一個東西，甚至像一個活的人一樣。「國家即是上帝在大地上的存在」（黑格爾語），便是抽象概念具體化及擬人化（personification）的最顯明例證。其他如像「歷史的意志」、「歷史的幽靈」、「上帝的意志」……也都是抽象概念具體化的語詞。這種抽象概念具體化的結果，一方面足以釀成概念系統的混亂，另一方面又增加陳述在經驗證明上的困難。事實上，「一切的概念都是關於真實的抽象。」（Concepts are abstractions from reality.）「一個概念乃是一個心智的建構或抽象的觀念；它所指涉的，不是某一類現象，便是某一類現象所共有的特性。」（註一三）所謂「國家」乃是一羣人在行為互動關係的產物，所謂「歷史」乃是過去的人類活動之過程，所謂「上帝」乃指一羣人的信仰之表徵。它們的自身祇是概念，並非具體的東西。

根據上述有關神學及文學的政治研究之分析，它們在概念的製作及陳述的建立上，既缺乏經驗的指涉，又經不起邏輯的檢證，當然不合理論建構的原則。因此，不論這兩類的研究曾經建立了如何類似理論的「偉大系統」，都無法承認它們是理論化了的研究。經驗科學中的理論系統，從最低層級的概念之抽象，名詞的嚴格界定，到最高層級的統一理論之建造，不僅有一個邏輯系統之統攝，而且每一層級以及層級之間的關係，也必須透過經驗的證明。此種理論系統中任何一個基本概念的被推翻，或任何一個陳述的被否定，必導致整個系統的崩潰。神學或文學的「理論」，在理論建構的原則衡量之下，根本不是理論。有的人認為這些神學或文學的「理論」，應改稱為意識型態 (ideology)，以免與科學理論混淆，便是這個道理。

政治研究的第三個基本類型是經驗的。此一類型的政治研究，雖然古代也有，但到了二十世紀才普遍起來。其所以很快的普遍起來，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個是因為政治的研究者受了自然科學的刺激，深悉尋求知識的有效途徑是科學方法，另一個是因為政治研究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已經漸漸變成了一獨立的學科。若就經驗的政治研究，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它與上述的兩個類型有很大的區別。經驗的政治研究也有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是強調經驗的調查，第二是重視概念的澄清，第三是趨向經驗通則的建立。

經驗的政治研究，自從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注意客觀事實的搜集，到了二十世紀，由於自然科學的影響，更傾心於科學方法的因素之一，即所謂觀察。但是，政治事實難於作控制的實驗，於是便採用了廣泛意義的實驗方法——經驗的調查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通過經驗調查的方法，政治學所搜集的資料，大體上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情狀資料 (situational data)。此類資料乃是根據法律研究法及制度研究法所獲取到的，多半屬於法律條文及制度結構的有關資料。另一類是行為資料 (behavioral data)。此類資料乃是根據社會學研究法及心理學研究法而得來的，多半屬於個人行為、團體行為或行為互動的有關資料。(註一四)這些資料，在量方面的確是頗為可觀，可是在質方面仍不够精。其所以不够精，乃因有效的資料搜集，必須要依賴理論的背景或精密的假設，才可能達成。因此，仍有人譏評現代政治學的狀況，是理論的貧血及資料的充血。資料的搜集祇是科學研究的起點，如果不能發現資料的共有特點，或者資料與資料的因果關係，資料的堆積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不過，強

調經驗的調查，比之根本忽略經驗的印證，乃是一種進步的象徵。

經驗的政治研究，既然強調經驗，因此對於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則比較重視其經驗的指涉。概念的經驗指涉一經被重視，則概念的澄清工作便會收到效果。現代政治學中，雖不是所有的名詞都有清楚的界定，雖不是所有的概念都有明白的指涉，雖不是所有的陳述都符合經驗的印證，但是，像神學或玄學似的概念及陳述，的確是在逐漸絕跡之中。比如，主權、國家、自由、平等……等等名詞，經過現代政治學的努力，已經比十七或十八世紀的時代，要明確得多，要清楚得多。

除了經驗的強調及概念的澄清之外，經驗的政治研究，無論如何也建立了一些有關政治現象的經驗通則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這些通則運用在解釋及預測上，其範圍雖不夠廣，其程度雖不夠精確，可是它們都是依據理論化的準則，通過經驗的印證及邏輯的推理，而建立起來的。它們的鞏固性，雖不如自然科學的理論，但稱它們為小型理論或準理論 (quasi-theory)，也許是適當的。現代政治學，通過經驗研究的努力，所建立起來的「準理論」已經不少。如像「投票理論」、「組織理論」、「決策理論」，與典型的科學理論比較起來，自然相去甚遠，而它們的建立的確代表了政治學極具進步意義的發展。

當其對於經驗的政治研究，作了以上的說明之後，如再以理論建構的標準加以評論，我們仍發現此一類型的政治研究並未達到充分理論化的水準。既未充分理論化，亦必然沒有進入充分科學化的境地。嚴格的講，經驗的政治研究祇是走向理論化及科學化的起端，距離充分理論化及充分科學化尚有一段遙遠的路程。其所以如此，乃因這一類型的政治研究，其精確的程度及建構的高度，都尚未達到理論建構所要求的水準。

經驗的政治研究所搜集到的資料，並不是在一個理論的系絡 (theoretical context) 中而進行的。因此，搜集到的資料，對於概念、陳述及通則的印證上，發生的效力不夠理想。甚至有的資料，對理論建構而言，根本沒有任何關聯，造成研究工作的浪費。至於基本概念之澄清，無論是分類工作、界說工作、或經驗印證的工作，都沒有達到標準化的地步。當其概念未達到高度的澄清，名詞未能嚴格的界定，那麼做效其他高度發展的科學，採取符號化或建構語言的陳述表達，則沒有可能。概念的製作及陳述的建立，未能完全符合理論建構的準則，而根據它們建造出來的經驗通則，怎麼可能達到精確的程度呢？由於以上的原

因，所以我們肯定經驗的政治研究，依照理論化的標準而言，其精確的程度還是不夠。

退一步講，假定現代政治學所建立的經驗通則，已經達到够水準的精確程度，可是也祇符合理論化的低層次準則，亦不够充分理論化的水準。因為一個學科的充分理論化，必須是整個理論系統的完成。通則祇是一個普遍性的陳述，在理論建構的層級系統中，它的高度，離最高層級的統一理論，依然頗有差距。經驗科學的理論建構，其終極目標乃是在建立理論系統。通則祇代表理論系統中的一個層級，它必須經過整合使其成為理論，再經過理論的整合，才可能實現統一理論。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所有的層級都是理論系統的必要條件，任何一個層級的缺少，即等於理論系統不存在。但是，就建立的困難程度而論，從低層級到高層級乃成正比比例的增加。層級愈高愈複雜，需要顧及的變數也愈多。因此，就假定現代政治學中的經驗通則，已經達到够水準的精確程度，而從通則的整合到理論，從理論的整合到統一理論，也有一段遙遠的路程，也是現代政治研究很難實現的。依照政治學家伊斯登(David Easton)的看法，政治學的一個統一理論之建立，也許要幾代人的長期努力，才可能實現。(註一五)

關於政治研究的狀況，我們已分成三個基本類型，作了一全面的分析。依據理論建構的層級及其原則，作為衡量的標準，神學的政治研究及玄學的政治研究，根本沒有從事理論化的工作；它們所建造出來的「理論」，祇是與經驗科學的理論同用一個名詞，並不屬於經驗理論的範圍。它們的「理論」改稱意識型態，也許更為適當。(註一六)經驗的政治研究，雖開始從事理論化的工作，却仍停滯在理論建構的低層級之中；所建造出來的「理論」祇是經驗的通則，或準理論。如此說來，政治研究的整個狀況，離充分理論化的水準，還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如果充分理論化是充分科學化的條件，已為我們所接受，那麼我們不能不承認，到目前為止，政治研究並未達到充分科學化的境地；頂多祇是正在科學化的開始階段。

### 三、現代政治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本文的第一段裡，肯定了理論化或理論建構是科學的特性之一；理論化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在第二

段裡，又指出政治研究並未達到充分理論化的程度，直到現在仍停滯於理論化的開始階段。那麼政治研究如要企圖充分科學化，變成一個成熟的經驗科學，其主要的方向必然是加速理論化，並建立屬於政治學的獨立的理論系統。

最近二十餘年來，關於政治學如何理論化的問題，已為一般政治學家密切注意。尤其是伊斯登更是非常強調，不遺餘力的倡導統一理論之建立。(註一七)伊斯登的貢獻是雙重的：一重是消極的批評，另一重是積極的建設。他的批評很有啓發性。他認為「政治學的主要缺點之所在，乃是對於事實與政治理論之間的關係以及理論在此一關係中的重要地位，未能充分的加以了解。」

(註一八)這句話乃在指出，政治研究的最大失敗，就是在研究過程中政治理論與政治事實之間常常互不相關。事實的搜集沒有理論的指引，理論的建造又沒有事實的印證，甚至，根本不知道事實與理論是相互依存的。這一種的無知或忽略，主要原因即是政治學太缺乏理論化的基礎之所致。嚴格的講，「事實乃是根據理論的興趣，對於真實所作的一個特殊安排。」(註一九)事實的搜集是企圖達到經驗證明的目的。如果沒有需要證明的假設，事實的搜集便失却了目的，等於沒有意義。盲目的搜集事實，沒有理論建構作為背景的搜集事實，甚至誤以為事實即知識，在伊斯登看來，即是誇大的事實主義(hyperfactualism)。這種誇大的事實主義，自南北戰爭之後，一直佔據着美國的政治研究。(註二〇)伊斯登雖然批評誇大的事實主義，但並非玄學「理論」的擁護者。他認為玄學「理論」是價值的理論，毫無經驗上的可證性，他所企圖追求的理論，乃是有可證性的因果理論。

伊斯登批評政治學的現狀，其目的是要積極的為政治研究尋找一條出路。這便是建設性的一方面。他認為現代政治學主要的努力方向，即是建立一個屬於政治學自身的統一理論或巨型理論(general theory or macrotheory)。他說：「統一理論是因果理論的一個類，就範圍說，其衍生出來的運用性可以涵蓋整個的研究領域，與單一性的通則或局部性的理論比擬，顯然有所不同。在政治學中，此種統一理論，乃是企圖對整個政治系統的功能作一說明。」(註二一)並且他指出，建立統一理論的途徑，有三方面最值得注意：(1)認清政治系統中的變數，(2)確立變數之間的關係，(3)通過一套具有邏輯鞏固性及依存性的通則，再系統的解決上述兩方面的問題。(註二二)這三個方面，與本文前述理論建構的層級次序比較，是相當一致的。第一方面是關於概念的製作，第二方面是屬於陳述的建立，第三方面則是統攝所有的概念及陳述在一個鞏固的邏輯系統中，以達成理論的建造。

關於政治學的統一理論或理論系統之建立，不僅是伊斯登及少數政治學家在倡導，而且已經成爲現代政治研究的主要方向。這種研究趨勢，表現於現代政治學的「雙重革命」(dual revolution)(註三三)中。「重是概念製作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concepts)，另一重是理論整合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ies)」。兩者都屬於理論建構的層級，都是理論化的步驟。概念製作在經驗的政治研究中，雖一向比較注意，但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強調。現代政治學對於各種概念，都非常重視其經驗的指涉。如像，「團體決策」(group decision-making)、「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衝突功能」(conflict function)……等等，莫不涉及到一個極複雜的行爲互動。對這些名詞，現代政治學則採取運作程序及廣泛的經驗調查，來從事界定工作，而且做得相當成功。此種工作的成功，當然與研究技術的進步有密切關係。也即是說，若沒有問卷法、局內觀察法或內容分析等技术方法的幫助，對於複雜行爲的概念從事運作界說，則不可能。(註三四)

現代政治學的重視基本概念之澄清，可從衛爾頓的「政治學的字彙」。(註三五)及拉斯衛爾與開普蘭的「權力與社會」(註三六)兩本著作中，看得出來。前者從語意學的觀點，對傳統政治學中的含糊概念，作了系統的批評。後者根據理論建構的原則，對政治學中基本名詞之界定，作了一系統的重建工作。至於從科學哲學的觀點，討論有關政治學的概念形成之問題，最具深刻卓見者，則應算開拉鮑。開拉鮑在其「概念的形成與規範性及經驗性之研究：政治理論之調和」(註二七)一文中，企圖將關於規範性的概念，透過經驗運作的程序，變成具有經驗指涉的名詞。果能如此，則政治學的研究，即可在價值研究方面展開經驗調查的工作。也等於消除了價值與事實的鴻溝，使價值研究從玄學的領域移至科學的領域。開拉鮑的這種企圖，在政治學的概念製作問題上，可說是最具革命性的意義。

至於理論整合的革命，從現代政治學中各種巨型的經驗理論之發展，也可看得出來。如像，賽蒙的「決策論」(註二八)，亞蒙的「功能論」(註二九)，浦賴休的「組織論」(註三〇)及伊斯登的「系統論」，都企圖用一個巨型理論，來整合政治學中的其他理論，而變成政治行爲的統一理論。此種系統的理論整合，雖然不是一蹴而成的，但其傾向却代表了現代政治學的大變革。誠如亞蒙所說：「在現代政治學中，「系統概念的介入乃是走向科學化的最重要步驟。」(註三一)

不論是從概念製作或理論整合所發生的革命，莫不屬於理論建構的強化。因此，也可以說，所謂「雙重革命」，即等於現代政治學企圖在充分理論化或理論系統之建立上的一個自覺運動。

從伊斯登的分析及政治學的「雙重革命」看起來，現代政治研究的主要方向，很明顯的是關於政治學的理論化問題。這一方面雖然很明確，可是要如何才能有效的達到理論化的目標，却是很困難的。這些困難來自多方面：有的屬於概念製作，有的屬於陳述建立，有的屬於理論整合。以下，我們想從這三個方面的困難，作進一步的分析，並提示克服這些困難的方式。

### 1. 概念製作方面

在理論建構的層級中，概念是最低的一個層級。它是理論的基礎。沒有成功的概念製作，則陳述、理論及統一理論便不能繼續推進。任何概念皆是關於真實世界中某些事物的抽象。政治學中的概念，當然是關於政治現象的抽象。而政治現象的抽象，必須依賴對於政治現象的有效觀察。有效的觀察若不能達到，概念的抽象便不可能精確。到目前為止，政治學既不能作控制實驗的觀察，也未能做到可靠的經驗調查。因此，政治學中的各種基本概念，依然缺乏經驗指涉的精確性。比如，「民主」或「獨裁」這兩個名詞，不同的政治學者常常有不同的用法。其所以如此，便是這兩個名詞所代表的概念，沒有共同公認的經驗指涉作為標準。當這類極尋常的概念尚沒有在製作上達到精確的程度，其他比較更難了解的概念，就更用不着說了。

概念的澄清工作或名詞的界定工作，雖然現代政治學已經作過不少，但離理想的程度依然很遠。這些工作的有效從事，仍舊是今後政治研究的一個重要目標。大體上說來，概念的澄清工作或名詞的界定工作，有兩個可行的途徑。一個是經驗印證 (empirical confirmation) 的途徑，另一個是再概念化 (reconceptualization) 的途徑。所謂經驗印證的途徑，即是就每一個概念的界說所蘊涵的意義，通過經驗調查來印證的工作。如果有經驗上的印證性，這個概念便可保留而加以使用。如果沒有經驗上的印證性，這個概念則必須放棄。所謂再概念化即是：為着使一個意涵過分歧的概念變得更清楚更明白，而採取的一種再界定 (redefinition) 的方式。不過，這個新的界說，其意涵也必須要通過經驗上的印證，才能成立。

### 2. 陳述建立方面



如果說概念是理論的基礎，則陳述就是從概念到理論的橋樑。有了健全的概念，若沒有健全的陳述，依然談不到理論。關於政治現象的陳述，比關於自然現象的陳述，要困難得多。一個自然的研究者，可以完全免除主觀願望的影響，而能對自然現象作客觀的陳述。可是，一個政治現象的研究者，當其在作客觀事實的陳述時，很容易帶進其自身的主觀願望。這就是關於政治陳述的建立，所遭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另外，也由於政治現象產生於人類行爲的互動關係中，而人類行爲，又常常是根據他們的信仰、愛好及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因此，當其一個政治的研究者，對政治現象作事實陳述時，假定他已經百分之百的客觀，毫無自身主觀願望之介入，他的陳述中亦難免除使用有關價值或信仰的語句。這便是關於政治陳述的建立，所遭遇的第二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比較容易克服，因為研究者的主觀願望絕不可混入事實陳述中，已為一般政治學家所承認。既然承認了這一個前提，進一步的問題，祇是如何有效的免除主觀願望的技術問題，當然比較容易。而且現代政治學中，在免除研究者的主觀願望混入事實陳述上，已經獲致了一些有效的設計。比如，經驗調查的技術之進步，邏輯檢證的方法之進步，建構語言的方式之試行，在免除主觀願望混入事實陳述上，都是不無效用的。

第二個困難是比較難於克服的。因為一個政治陳述能否容許價值概念的出現依然是一個爭論，有的人反對，有的人贊成，至今仍未得到一致公認的結論。反對的人，認為價值概念沒有經驗的可證性，一旦出現在政治陳述中，則勢必引起整個陳述也沒有經驗的可證性了；他們堅信政治陳述祇問事實而不問價值的原則。贊成的人，則認為政治研究的對象是人的行爲，並非自然現象。而人的行爲必然受到他所持有的價值觀之影響，甚至不可分。因此，他們堅持，政治行爲的研究必脫離不了價值概念的研究，關於政治現象的陳述也必會使用價值概念。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研究者的主觀願望，雖不可介入研究過程中，但價值必然是政治研究不可避免的對象。在我們看來，雙方都有道理。既承認凡是不可證的概念都不能出現在政治陳述中，也承認政治陳述與價值概念是不可能完全分開的。在這樣一個了解方式之下，於是雙方爭論的中心便轉化成價值概念能否可證的問題。如果價值概念可證，則能納入政治陳述中；反之，則不能納入。

價值概念是否可證，乃決定於關於價值概念的界定。如果像神學以價值爲「上帝意志的表現」，或像玄學以價值爲「絕對觀念」，則永無可證性之可能。如果像現代社會研究中，界定價值爲「可欲的觀念」(註三二)，則又不是沒有可證性的。現代社會研究中，使價值概念或價值名詞變成可證對象的研究法，正在努力發展中。其中有兩個主要的研究法，一個是運作界說的研究法 (the operational-definition approach)，另一個是目的與手段的研究法 (the means-end approach)。前者是透過適當的界說，去從事經驗的印證，後者是將目的價值化成手段價值，以便於從事經驗的印證。大體上說，價值概念，雖不是直接的可觀察項，但有間接的可證性。如果價值概念真有經驗的可證性，則與事實概念無異，當然可以納入政治陳述。

### 3. 理論整合方面

健全的概念，可以幫助產生健全的陳述；一套健全的陳述，如既有邏輯的推演性，又有經驗的可證性，則可成爲一個理論。但是，倘一個學科中祇有一些個別的理论，其間互不相關，未能納入一個更高的統一理論中，依然不能成爲一個理論系統，依然未能達到充分理論化。所以理論整合的工作，也是使一個學科充分理論化，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

政治學中的理論整合，若與前兩方面比較，其困難性更多。理由很簡單，因爲前兩方所遭遇的困難，必同時爲理論整合的困難。欲要整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理論，使其納入更高的理論層次中，必須先將這些理論分別加以化約，使每一個理論所蘊涵的陳述及概念，都能充分明白。然後比較這些理論的特點何在，這些理論說明的真實世界之異同何在。再才可能抽離它們的共同特點，而發展成爲一個更高的理論。這一過程的進行中，隨時可能發現被整合的理論之中，所使用的陳述及概念不清楚不明確，也可能發現被整合的理論缺乏經驗的印證性或邏輯的推演性。因此，理論整合的工作是雙重性的。一面要嚴密考察所有被整合的理論，另一面又要從事更高的理論之建造。

關於考察一個理論是否具有經驗印證性及邏輯推演性，最簡便的方法即是使用這個理論去從事經驗世界中的解釋及預測。如解釋及預測有效，則此一理論是健全的，反之，則不健全。不健全的理論，必須加以修改之後才能納入理論系統中。關於政治現象的理論之整合，有時還得採用其他學科的理論作爲參考。因爲政治現象是社會現象中的一個類，其他有關社會現象的理

論，很可能正是政治學所需要的，也很可能幫政治學達成理論整合的工作。這也就是政治研究要提倡多學科研究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的原因。

根據以上三方面的分析，關於政治學充分理論化之實現，或者關於政治學理論系統之建立，實在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怎樣才能克服這些困難，也找不出一套具體的方案。不過，使所有從事研究政治現象的人，都具有強烈的理論意識，並充分了解理論建構的原則及其層級，也許是推進政治研究達到充分理論化的一個先決條件。

## 結 語

政治研究是否能夠變成科學的研究，以及政治理論是否可以成爲經驗的理論，這一類問題乃是當代政治學所討論的中心問題。（註三）本文祇是憑藉當代政治學家對於這類問題的討論作爲背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所從事的分析。這一分析得到了三個結論：(1)任何經驗科學必然是一個獨立的理論系統，而理論系統的建立，祇有依據理論建構的原則及層級而推進始有可能；(2)一個學科是否充分科學化乃決定於它是否具有一個獨立的理論系統，準此而論，政治學直到目前爲止並未達成充分科學化的程度；(3)根據(1)及(2)的肯定，政治研究如要充分科學化，其主要的方向必然是：依據理論建構的原則及層級而從事理論化及理論系統之建立。

從以上的三個結論，我們可以充分的看出，理論建構的原則與政治研究的理論化及科學化是具有不可分的關係的。可是理論建構的問題乃是一個科學哲學的問題。因此，從事政治研究，對於科學哲學的知識是不可忽略的。當代一位政治學家曾說：「就事實而論，關於當代政治學的主要批評，即是政治學在吸取科學哲學中可資利用的知識準則上，仍然處於失敗的狀態中。」（註三四）這句話顯然也是在強調科學哲學對政治研究之重要性。

## 附 註

- 註 1•Robert A. 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December, 1961), pp. 763-772.
- 註 11•"The empirical sciences are systems of theorie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therefore be described as a theory of theories." See Karl R.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utchinson, 1952), p. 59.
- 註 13•"A theory is a systematically related set of statements, including some lawlike generalizations, that is empirically testable." See Ricard S. Rudner,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rentice-Hall, 1953), p. 10.
- 註 14•Bertrand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London, 1913), p.140; see also Mary Hesse, "Laws and Theorie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4 (Macmillan, 1967), pp. 404-405.
- 註 15•Herbert Feigl, "The Scientific Outlook: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in H. Feigl & M. Brodbeck, ed.,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 1953), pp. 10-11.
- 註 16•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443-445.
- 註 17•Claire Selhiz et al.,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Holt, 1963), p. 2.
- 註 18•政治學在大學裡設為專門課程，變成一個獨立的學系，乃開始於十九世紀的末葉。See William A. Robson,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of Social sciences: Political Science* (Leiden: Published for UNESCO by A.W. Sijhoff, 1954), pp. 22ff.
- 註 19•關於知識發展的階段，孔德 (A. Comte) 曾提出所謂「三階段定律」(the law of three stages) 之說。他認為一切知識的成長，都必然通過神學的階段、玄學的階段及實證的階段。本文關於政治研究的分類多少受到孔德之說的啓示，但在性質上並不一樣。孔德強調時間順序，本文祇注重獲取知識的方式。
- 註 10•Joseph S. Roucek et a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Growell, 1950), p. 2.
- 註 11•Reinhold Niebuhr, *Faith and History* (Scribner, 1949), p. 67. 里柏是美國人，出生於一八九二年。他是當代著名的神學家，也是一個政治思想家。尤其是他的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一書，更是傳誦甚廣。

註一二•耶士培是德國人，出生於一八八二年，他是當代著名的實存論者。他的政治思想是以道德觀念作為中心的。See Karl Jaspers, *The Future of Manhood*, Trans. by E. B. Ashton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1). 羅柯（一八七五——一九三五）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See A. Rocco, *The Political Doctrine of Fascism* (Carnegie Endowment, 1926).

註一三•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Historiography, Bulletin 64,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 (SSRC, 1954), p. 91. Cited by Vernon Van Dyke, *Political Science: A Philocophical Analysis* (Slevens, 1960), p. 62.

註一四•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Knopf, 1964), pp. 139ff, 200ff.

註一五•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Wiley, 1967), pp. 9-10.

註一六•政治理論一詞，在現代政治學中的用法，頗不一致。有時的用法，專指現代經驗理論。有時的用法，除了經驗理論之外，也包括政治思想，意識型態在內。但有些著作中，甚至政治學的教科書中，已經很顯著地把傳統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學說，放在意識型態的範圍內。

註一七•David Easton 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自一九五三年出版「政治系統」一書，對於政治學的狀況作了系統的分析及批評之後，一直倡導「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r systematic theory）」繼「政治系統」之後，他為如何發展政治學的統一理論，曾經寫過兩本著作。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註一八•“A major source of the shortcomings in political science lies in the failure to clarify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s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vital role of theory in this partnership.”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p. 4.

註一九•“A fact is a particular ordering of reality in terms of a theoretical interest” *Ibid.*, p. 53.

註二〇•*Ibid.*, pp. 66 ff.

註二一•“A general theory is a type of causal theory that differs from singular generalizations and partial theories, in scope at least, by virtue of its presumed application to the whole of a field of inquiry. In politics, it seeks to illuminate the functioning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their entirety.”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p. 8.

註二二•*Idem.*

註133••This term used by David Easton i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Prentice-Hall, 1965), p. 17. 本文祇採用這個名詞，其用法與伊斯登原意，並不相同。

註134••Arthur L. Kalleberg, "Concept Formation in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Studies: Toward Reconciliation in Political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March, 1969), pp. 26-39.

註135••T. D. Weldon, *The Vocabulary of Politics* (Penguin Books, 1953).

註136••Harold D. Lasswell &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註137••A. L. Kalleberg, *op.cit.*

註138••Herbert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Macmillan, 2nd ed., 1957).

註139••Gabriel A. Almond, "Introduc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 A. Almond & J. S. Coleman, ed.,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註140••Robert Presthus,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 An Analysis and a Theory* (Random House, 1965).

註141••Gabriel A. Almon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Ithiel de Sola Pool,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McGraw-Hill, 1967), p.12.

註142••Clyde Kluckhohn, "Values and Value-Orientations in Theory of Action", in T. Parsons & E. A. Shils, ed.,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395.

註143••Harold D. Lasswell,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0 (December, 1956), pp. 961-979; David G. Sm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Sept., 1957), pp. 734-746; David E. Apter,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Sept., 1957), pp. 747-762; Bertrand de Jouvenel, *The Pure The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Ithiel de Sola Pool,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McGraw-Hill, 1967).

註三四••Eugene J. Meeha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Analysis* (The Dorsey Press, 1965), p. 15.

本文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謹此致謝。